

让革命文物成为老区振兴的“红色引擎”

周亚

革命文物是革命先辈英勇奋斗的实物见证,也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生动教材,具有精神和物质双重价值。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2021年印发的《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指出,繁荣发展红色文化,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增强革命老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社会各界要将革命文物资源利用好、转化好,使其成为推动老区经济社会振兴的“红色引擎”。

让革命文物成为老区经济振兴的关键要素

以革命文物为核心,深度发展文旅产业。革命老区往往地处边远山区,生态环境良好,自然景观优美,乡村氛围浓厚,不少老区还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具备深度发展文旅产业的良好基础。要盘活老区的革命文物资源,将其中蕴含的红色文化与绿色生态景观相结合,与乡村休闲相结合,与地方历史文化相结合,形成多元化的文旅产品。可依照主题和地域开发文旅线路,将革命旧址、纪念馆等红色景点与风景名胜、特色村落、历史古迹相互串联,使游客在感受老区红色文化的同时,欣赏优美自然景观,感受乡村风貌,了解历史文化,为游客提供多样化的文旅产品,增加文化内涵,丰富游览体验,为老区经济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以革命文物为引子,促进产业提质升级。以革命文物为关键抓手,增强吸纳就业能力,提升群众收入。将红色文化和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机融合,发展文创产业,开发红色纪念品和地方手工艺品,同时,要结合革命文物,打造红色品牌,并通过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开发农产品礼盒、伴手礼等方式,将老区产品做细做精,以提高产品附加值。依托革命文物,围绕红色资源开发乡村旅游项目,让游客吃农家饭,住农家屋,感受乡村生活,体验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此外,以红色IP为引领,发展老区赛事经济。利用老区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举办马拉松、公路自行车等赛事,通过赞助、冠名等形式,多措并举提升老区经济效益,扩大老区知名度。

以革命文物为依托,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革命老区多地地处偏远,经济与财政水平无法与发达地区相比拟,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城市建设和景区配套不足,无法满足文旅及其他产业发展需要,人居环境亟须改善。一方面,老区要以革命文物为依托,积极申请财政资金予以支持,加大对革命旧址的保护力度,加强纪念馆、展览馆等场馆建设,提升活动举办和接待能力。

通过建设旅游公路,发展公共交通,将各类景区有机串联的同时,改善老区群众出行条件。加大力度改善老区市政设施,加强老城镇道路硬化、城市亮化、环境美化。另一方面,运用多种融资渠道和融资手段,积极引入社会资金,完善老区基础设施。以红色景区为核心,通过增加配套设施,改善周边环境,对景区进行提质升级。鼓励各类经营主体投资运营酒店、超市等,改善老区商业环境,加强老区文体设施建设,兼顾产业发展的同时满足群众需求,提升老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让革命文物成为老区社会发展的重要引领

以革命文物为载体,提升老区社会精神风貌。老区有着深厚的红色底蕴,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区人民曾在这里一起艰苦奋斗,为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苏区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南泥湾精神、太行精神、沂蒙精神等,无一不是在老区孕育和发展的。革命战争年代,老区人民坚持党的领导,舍生忘死,无私奉献,和党鱼水情深,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这些精神既是老区人民的光荣传统,也是老区鲜明的精神底色。革命文物是这些精神的物质载体,要通过深入阐释和广泛传播,将有形的革命文物转化为无形的精神,贯彻到老区精神文明建设当中,更好地激励老区干部群众发扬光荣革命传统,为老区建设凝聚起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以革命文物为抓手,提升老区社会治理效能。社会治理关系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须臾不可离党的领导。革命文物是加强党的建设的生动教材,深入挖掘文物背后的精神内涵,通过红色展馆微党课、革命文物故事宣讲等形式,强化老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将老区的优良传统和现代乡规民约融合,增强老区基层社区的凝聚力和自治能力。借鉴“枫桥经验”,结合老区优良传统和作风,直击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堵点,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维护老区社会和谐稳定。

以革命文物为纽带,加强老区人才体系建设。人才是老区持续发展的根本。要以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为纽带,健全老区人才体系,壮大老区人才队伍。要积极联合高校和研究机构,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相关专业建设,设立面向老区的专项招生计划,为老区培养革命文物专门人才。要加强老区人才引进工作,吸引引进历史学、考古学、博物馆学、档案学以及文旅等相关毕业生到老区工作,鼓励老区生源回乡发展,

服务桑梓。要提升老区人才留用能力,通过改善生活条件,提升工作待遇,提供干事创业平台,使各类人才能够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真正成为服务老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让革命文物成为老区文化复兴的重要纽带

以革命文物为根本,打造老区红色地标。老区是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其中大量的革命文物承载了重大历史事件,是老区的独特印记。要围绕革命文物加强地标建设,通过打造类似“抗战精神溯源地”“八路军故乡”为主题的文化符号,使之成为老区的文化地标,扩大老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要创新宣传方式,在传统传播方式基础上打造全媒体矩阵,加强新媒体运用,利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拍摄以老区革命遗址、革命人物、革命事件为主题的短视频,扩大传播范围。青少年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和后备力量,要面向青少年群体,以青年群体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红色文化,赓续红色血脉。

以革命文物为支点,建设老区教育高地。革命文物是传承革命精神、弘扬革命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要依托老区革命旧址、纪念馆等设施,构建研学旅游等多元教育场景,打造集聚革命传统教育和国防教育为特色的青少年研学基地,运用红色研学+拓展+情景体验等方式,增强广大青少年的爱国情怀和历史责任感。要依托革命文物,建设面向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的教育培训基地。通过参访革命旧址、传唱革命歌曲、讲述革命故事、重走革命道路,使参与者深切感受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强化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要创新培训教育形式,以革命文物为主题,运用多种形式,开展入职教育、入学教育和入伍教育,更好地鼓舞激励干部职工弘扬光荣革命传统。

以革命文物为基础,推出老区研究成果。老区是中国革命的大摇篮,在这里发生过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留下了丰富的文献和实物资料,这些不仅是重要的革命文物,也是开展历史研究的重要素材。要整合文物、党史、军史、档案、地方志等方面研究力量,深入开展实物、文献、档案、口述等史料收集整理,加强老区革命文物发掘和保护。加强对革命文物研究的支持力度,资助优秀研究成果发表出版,推出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深入挖掘革命文物深刻内涵,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加强相关成果转化,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讲好老区故事,展现老区风貌,提升老区文化影响力,带动老区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副院长)

镜鉴千年

在历史长河中,铜镜不仅是古人理容的日用之物,更承载着文明交融的深刻印记。近日,由黑龙江省博物馆精心策划的“镜鉴千年——黑龙江省博物馆藏宋金铜镜展”面向公众开放。展览分为五个单元,集结近百面珍贵宋金铜镜,以镜为媒,穿越时空,生动展现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文化碰撞融合的壮阔史诗。

鱼纹作为铜镜装饰可追溯至汉代,在金代绽放异彩,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主流纹饰。这一文化现象的兴盛,与女真族依水而居、以渔猎为生的生存方式密不可分。展出的十余面双鱼纹铜镜,绝大多数出土于黑龙江省境内,清晰勾勒出金代核心统治区域的文化风貌。同时,吉林、河北、内蒙古、甘肃等地同样纹饰铜镜的发现,有力印证了金代双鱼文化在北方中国的广泛传播与深远影响,为研究金代社会文化版图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

金代龙纹镜并非对唐代风格的简单模仿,而是在继承其雄浑基调的基础上锐意突破。其中,双龙纹镜尤为盛行,其数量之多,在出土金代铜镜中仅次于风靡一时的双鱼镜,足见其受推崇的程度。其造型粗犷奔放、雄浑豪迈,线条遒劲有力,展现了女真工匠的创新精神,映射出一个崛起于北方的王朝所特有的气度与自信。

人物故事镜尤为丰富,镜面镌刻着为人知的历史传说与民间故事。这些源自中原大地、广泛流传的故事题材,被精心移植到铜镜这一载体,其背后是宋金时期汉文化与女真文化在经济、文化、思想领域深度交流、互相渗透与融合的生动见证。

瑞兽奔腾,花鸟争妍,每一面瑞兽花鸟纹铜镜,都是一幅凝固的盛世图腾,不仅凝聚了工匠巧思,更无声传递着宋金时期人们对祥瑞的祈愿、对自然的礼赞,以及对不同艺术传统的包容与创新。

宋代铜镜上的铭文,不仅是装饰,更为今人开启了一扇窥见宋人精神世界与市井生活的独特窗口。镜背之上,常铸有或婉约或直白的诗文题记,如“安明富贵,弗剑而镜”“菱芳耀日,冰光照室”“皎月澄河,晓云清波”等。值得注意的是,宋镜铭文见证了早期品牌意识的萌芽。“真”“真正一色”等强调品质与信誉的宣传字样频现,生动记录下宋代活跃的商品经济。

这些铜镜映现着穿越千年的铸造匠心,不仅是古人“正衣冠”的日常器具,其纹饰变迁也见证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磅礴历程。

(黑龙江省博物馆供稿)



“官口”款二童子攀枝纹镜



忠孝双重铭文镜

陕西宝鸡：“四个一线”宣传贯彻文物保护法

姬鹏

陕西省宝鸡市文物局将学习宣传贯彻新修订文物保护法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纳入全市普法宣传重点,面向文物普查、执法检查、宣教服务、考古发掘“四个一线”重要阵地精准发力,持续推动文物保护宣传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等。全市先后组织开展集中宣传活动35场次,覆盖群众超5万人次。

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宝鸡市采取市级组队、逐县普查的方式,集中力量、广泛动员,坚持普查到哪里,就把文物保护宣传到哪里,有效提升了文物普查成效。普查队员们化身一个个宣传员,像播种机一样将保护文物的理念播撒到宝鸡的田野乡村、城镇街市。新修订文物保护法颁布施行后,市普查队第一时间组织全体队员举办专题学习会,以“普查+普法”有效联动,旨在引导广大群众通过积极参与文物普查,树立文物保护意识,共同营造全社会保护文物的良好氛围。

宝鸡市文物局联合市司法局在集中宣传月,统筹安排文物保护普法宣传与执法检查工作。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立的宝鸡周原博物院,承担着几十平方公里的遗址巡查任务,遗址区内人口众多、活动频繁。如何让世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群众正确了解、保护与利用文物,需要长期的耐心宣传与引导。该院发挥驻守周原遗址的优势,组织宣传车辆走街串巷,反复播放法律条款,并多次组织干部职工深入村组农户、田间地头、农村集市开展宣传。

宝鸡市各级博物馆充分发挥宣传教育功能,结合“六进”活动,把《文物保护法》宣传带到群众身边、搬进中小学课堂。在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宝鸡市主场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前广场,全市各博物馆将《文物保护法》宣传作为必展项目和重点内容。此外,法门寺博物馆将普法宣传融入中小学生学习活动,陇县博物馆走进乡镇学校开办文物保护法课堂。

涉及文物保护前置的有关要求是《文物保护法》修订的一大亮点,也是宝鸡普法宣传的一个重点。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胡望林从事考古勘探发掘工作多年,对加强基本建设中的文物保护有着切身的体会。他和同事们一致认为:要想把文化遗产保护好,必须在事前防范上下功夫,尤其要从提升“先考古、后出让”等政策知晓率和执行度着手。秉持着这一理念,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定期组织人员深入考古发掘工地反复宣传,确保将《文物保护法》最新要求传递到每一个项目单位。结合文物保护前置要求的落实,不少县区以基层干部作为重点开展普法宣传,取得了较好成效。

图片报道



暑期,佛光寺内游客络绎不绝,东大殿一侧露天陈列的“求真·1937——纪念发现佛光寺88周年现场展”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观看。

1937年6月30日,中国营造学社成员梁思成、林徽因一行四人抵达山西五台豆村镇佛光寺;7月5日,确认佛光寺东大殿为唐代建筑,推翻了日本学者“中国境内已无唐代木构建筑”的论断。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策划推出的“求真·1937——纪念发现佛光寺88周年现场展”,结合多家单位收藏的资料和近年研究成果,以简洁的文字和精选的图片及绘图资料呈现了发现佛光寺的全过程。

本报记者 续红明 摄

观点摘编

考古学工匠夏鼐严把学风关

白云翔在2025年第7期《考古》撰文《夏鼐先生与〈考古〉杂志》认为:在夏鼐的学术人生和对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巨大贡献中,主持编辑学术刊物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夏鼐的办刊理念,集中体现在创刊号上的《发刊词》(尽管是时任副主编陈梦家执笔撰写)和夏鼐为《考古》创刊二百期所写的纪念文章《回顾和展望》中。从考古学的学科实际出发,坚持田野考古报告与研究论文并重、基础研究与阐释研究并重;及时介绍国外的先进经验,适当刊登书刊评介和读者意见;坚持以学术水平和学术质量的高低为取舍的标准,即“以文取文”而不是“以人取文”;既要坚持“百家争鸣”方针,更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编辑工作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下手”,做到“实事求是、认真负责、保证质量”。夏鼐的这些办刊理念,在其办刊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夏鼐办刊实践的突出特点之一,是他那认真负责的态度和敬业精神。他当主编从来不是“挂名”主编,更不当“甩手掌柜”,而是作为一项日常的重要的学术工作对待。

博物馆展览评选发展的国际视野

周婧景、沈雨晨在2025年第8期《故宫博物院院刊》撰文《博物馆展览评选发展的国际视野》认为:教育和服务公众已成为当代博物馆的要素,组织优秀展览正面临重挑战。如果我国的展览评选仍一味强调策展中程式化的操作环节,而不去关注“操作的目的及其专业度”,那么展览很难在质量上获得突破性改进。从博物馆方看,这种评选逻辑背后依循的是经验主义,只重视如何做、如何做好,而在认识论上却出现断裂。不知为何做,也不对其重要性加以评估。同时,我国博物馆采取集中型管理体制,依赖自上而下的考核和激励系统,因此深入考察当前博物馆展览评选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合理化相关主体的利益结构,进而构建专业化、可持续的评选标准至关重要且任重道远。如何留住并吸引观众,怎样获得新收藏或新成果,如何在主题、形式、参与等方面呈现更多创新等,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新问题。

中国古代地名位置的重构误差

蓝勇在2025年第4期《求索》撰文《中国古代地名的传承及其规律——以对“使君滩”的考辨为例》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地名的空间定位,历代都在不断重构之中。中国古代的地名空间重构往往都是在地名空间指示失传背景下的重构,且往往少有功利的左右,在客观上更多是因地名信息少、认知水平低和认知方法落后的局限形成的重构误差。只是到了近代以后,受争夺历史文化资源的功利影响,往往才会有主观上的重构偏差。透过近些年来有关地名传承的研究个案来看,中国地名学研究中亟须完善其内涵外延,努力将中国地名学的学科内容完整构建起来。地名传承学不仅对于地名学研究本身意义重大,而且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基础研究也相当重要,如历史地理研究中地名的谐音异写地名、异名同地、同名异地现象本身是历史上在地名传承过程中形成的,反过来又极大影响到历史地理的空间考证。认识到中国传统地名传承的规律后,我们自然也会对《山海经》《穆天子传》《尚书·禹贡》等文献中的地名空间的模糊状态有清晰认知,自然也不会费尽心力去复原一些古人本身就没有精准定位的地名空间。